

○ 引进与诠释

俄罗斯语言语义学近 30 年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

蔡 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1)

提 要:近三十年来,俄罗斯语言语义学研究范式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而显著的变化,从对语言生成机制的关注转向对语言进行解释,从形式-意义研究转向观念-现实研究,从同义关系转向多义关系,从对词义的清点到以语义衍生模式为依据的层级分布。这些变化和转换虽不及“乔姆斯基革命”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却颠覆了一系列传统思想和观点,关注到以往忽视或无力探究的领域,为语言语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继续彰显俄罗斯语言学独树一帜的魅力。

关键词:俄罗斯语言语义学;解释观;观念结构;多义词;语义衍生

中图分类号: H35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2-0070-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2.013

The Basic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Language Semantic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Cai Hu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s witnessed a series of dramatic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Russian language semantics. It has shifted from a focus on the generation of language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from form-meaning research to concept-reality research, from synonymy to polysemy, from an explanatory description of the meaning of words to the hierarchy based on models of semantic derivation. These changes, although not as impressive as Chomsky's Revolution, subvert a variety of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idea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reas ignored or unreachable in the past. They usher in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research work and continue to highlight the distinguished charm of Russian language semantics.

Key words: Russian language semantics; the concept of interpretation; concept structure; polysemy; semantic derivation

近 30 年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地区,语言学研究思想都发生了剧烈变革。从索绪尔结构主义思想遭遇危机到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面临的挑战,再到认知语言学的异军突起,无不在各个层面影响甚至决定着语言学领域各个分支的研究态势和走向。俄罗斯语言学研究思想在世界语言学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是唯一可以和欧美语言学思想媲美甚至是抗衡的国家。俄罗斯词汇语义研究就是典型一

例,其显著特点是对语言的内容层面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关注。词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先欧洲近百年以及在俄罗斯率先成立便是一例,对词义的深入研究在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学中形成了可靠且广泛使用的词义结构描写方法。正因为如此,在词汇语义研究领域,俄罗斯语言学受欧美思潮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要少得多。在审慎的吸收和碰撞中,在保持自己研究传统和品格的前提下,20 世纪的俄罗斯词汇学(乃至语言学)不但少受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语言学家帕杜切娃动态语义学思想研究”(13BYY16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俄罗斯词汇语料库之词义的动态模式及其借鉴价值”(10YJA740005)、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地铁文化建设成就对人文北京建设的启示”(14WYB017)阶段性成果。

所谓“致使其他国家的语言学‘瘫痪’的”结构主义危机的冲击(Чернышева 1999: 48),而且从中借鉴了对语言单位、系统关系的语义进行分析的形式化手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学科思想;20世纪下半叶,当转换生成语法风靡世界的时候,俄罗斯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在那个时代(20世纪60-70年代)免受生成主义影响的国家”(Рахилина 2002: 370)。这里指的是那种忽视甚至排斥语义研究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语言学家梅里丘克(Мельчук 1974)的《意义↔文本》转换模式代替了乔姆斯基的语言生成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树一帜并且影响深远的莫斯科语义学派;进入21世纪,当认知语言学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的时候,俄罗斯学者吸收其有价值的思想,提出了词义的动态研究模式,彻底颠覆了词义的传统研究,令人耳目一新。(蔡晖 2010, 2011)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语义学的发展代表了世界范围内语义学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前沿思想。(Падучева 2009: 635)在当前变化频至的语言学大语境中,总结和阐述俄罗斯近30年语义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和趋势,对于我们把握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基本动态并促进国内语言语义学研究,十分必要。

1 从语言生成观到解释观的转换

在理论语言学领域,上世纪50年代末掀起的乔姆斯基革命将生成的观点推向了巅峰(句子生成于词,词生成于词素),并风靡语法和语义领域,其中包括美国语言学家莱可夫(G. Lakoff)的生成语义和俄罗斯语言学家帕杜切娃(Е. В. Падучева)的句法语义研究。同样,梅里丘克《意义↔文本》(1974)的双向关系研究实际上侧重的也是生成一方,从意义生成文本,而不是相反。到上世纪80-90年代,一个尚未完全展现的、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悄然而生,并占据了优势,成为关注的焦点,这就是对语言生成观的反思乃至翻转,转向对语言进行解释,即从文本到意义的研究。在欧美,广泛吸收心理学和语言学养分的认知语言学悄然而生,旨在通过语言研究来解释人类的思维规律。

实际上,解释学方法早在1974年出版的俄罗斯语言学家阿普列相(Ю. Д. Апресян)的《词汇语义学》中便得到详细的论述和应用,这一方法后来在俄罗斯许多语言学家,如博古斯拉夫斯基(И. М.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布雷金娜(Т. В. Булыгина)、什缅廖夫(А. Д. Шмелев)、沙图诺夫

斯基(И. Б. Шатуновский)等的语义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如博古斯拉夫斯基(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1996)提出 большинство(大部分)的语义配价和为了填充这些配价必须在句法层面中出现的句法位。他并不是从深层语义着手,而是通过对表层句法的阐释(常常是多义的),并声称词汇的句法配价在深层语义结构中应该与语义配价相符,而句子的表层结构应该从深层语义结构中生成。

从语言生成观到解释观的转换很大原因在于转换生成语法自身的局限性,它忽视语义并走到了形式主义极端,其高度的形式化和抽象的逻辑运算往往难以验证。坦诚地说,语言的生成机制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谜。

相比而言,语言的阐释过程却是经得起分析和推敲的。我们每个人在进行言语交际时都有同样的体会,要为语言的理解自行提供脑补,无论是母语交际还是外语交际都是如此。那些掌握了丰富的语言知识、百科知识和交际技能的人,交际更容易取得效果,同时语言意义也往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语言生成机制是人类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语言的理解、解释或阐释能力同样也是人类语言能力的组成部分。对这一能力的研究具有显著且重要的优势,它不需要一个先验的命题或假设,也就是语言学家要为任何一个句子构建一个广谱的深层句法结构。“句法自治”的观点至今还没有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得到验证,其未来也难以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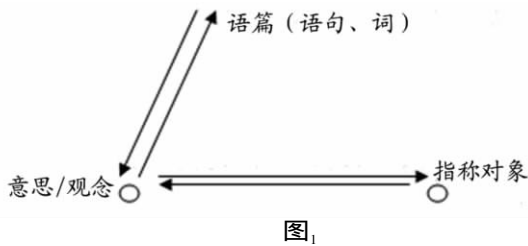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语言学从生成观到解释观的转换,将独立词语和结构的研究纳入了议事日程,为词汇语义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航向。在俄罗斯,“语义决定句法,通过句法研究语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且成为莫斯科语义学派的核心指导思想,而旨在揭示“句法天赋”的任务只能留待今后完成了。

2 从形式-意义研究到观念-现实研究的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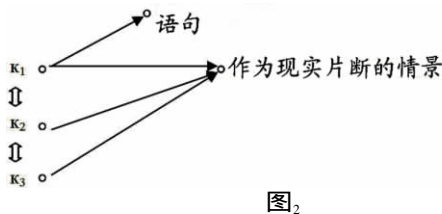
与上个世纪70年代相比,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对语言与现实之间相互关系的高度重视。尽管乔姆斯基(Chomsky 1977)仍坚持认为,语言学的重要任务是描写音与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与此同时,弗雷格符号三角的第三极——所指——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并带来词义研究范式的转变。

阿普列相指出,“每种自然语言都是反映感

知和组织世界的一定方式”(Апресян 1995: 350), 他称此为世界的观念化(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мира/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orld)。语句中呈现出的是通过观念化创造的有关世界片断的情景, 而不是所谓原生态的现实。弗雷格像区分词的意义和指称那样, 把与语句物质部分相对应的内容叫做意思(смысл), 当后者与情景对应时, 则称为观念(концепт)。(见图₁) 观念化情景(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ситуации/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ituation) 这一概念得到广泛普及。后来的语义学研究, 如维尔兹碧茨卡, 则将(语句、句子和语篇的)“语义结构”(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the semantic structure) 和“观念结构”(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conceptual structure) 相提并论(Wierzbicka 1996: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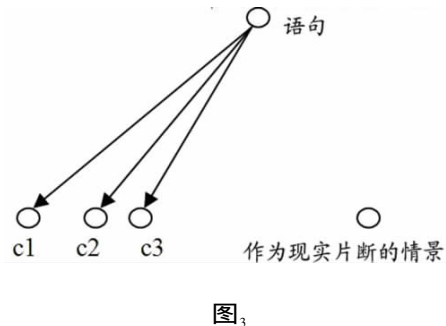
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阶段对同一个现实片段的观念化可能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的语言更是如此, 每一种语言都生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观念结构”被视为语言对现实进行观念化的结果, 是现实某一个片段在语言中的反映, 它强调的是现实与其在语言中的反映之间联系的任意性, 对这种任意性的研究成为后乔姆斯基时代语言学新范式的主流。(见图₂)



图₂ 显示了目前的研究路向, 这里 k_1, k_2, k_3 代表与同一个现实情景相关的不同观念或观念结构, 而“”表示的是这些观念结构之间的联系, 它们对应于同一个情景, 因而彼此能够比较, 区别之处仅仅(几乎是仅仅)在于关注焦点不同。此时, k_1, k_2, k_3 等观念结构与现实情景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重要, 而决定观念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焦点转换成为语义学研究的前沿任务。上文提到的动态语义学创始人帕杜切娃由此开启了词义的动

态模式研究。她认为无法研究观念与未经形式化的现实的关系, 转而描写与同一情景对应的各观念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多义词内, 当把对应同一情景的重点从动词的一个题元转到另一个题元, 或者从动词的一个语义要素转向另一要素, 就意味着对同一现实片断观念化有差异, 因为“感知、组织世界的方式”变了。

在此之前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 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见图₃, c_1, c_2, c_3 代表同一个语句中的不同语义; 三角形的第三个顶点实际上被搁置一旁) 语言(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大多在语言的指称理论框架中研究(Падучева 1985), 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词汇语义和句法语义。它沿袭结构主义学派的思想, 至多是跟两个实体打交道——形式和意义, 即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和所指, 梅里丘克称为文本和意义, 布龙菲尔德和哈里斯主要研究的也是形式。而语言同现实的关系少有人问津。



俄罗斯对观念结构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 它使语言文化研究领域遍地生花, 并引领语言国情学研究摆脱了长期面临的危机, 使语言文化研究得以登堂入室, “语言的世界图景”、“观念”和“表象”的研究成为俄罗斯语言文化学独具特色的符号(Апресян 1995; Урысон 2003; Зализняк, Левонтина, Шмелев 2006)。

3 由同义词研究转向多义词研究

众所周知, 多义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 至少有规律的多义性如此。(Апресян 1974) 然而多义词的研究却远远滞后于同义词。对于语言语义学而言, 上世纪 70 - 80 年代堪称同义词时代, 正是同义词开启了意义概念的定义之门。对多义词予以切实关注只是在最近 20 年的事。重视同义词研究可能与结构主义关注差异有关。结构主义者力图找出同义词之间最细微的差别, 并把它们当成语义上的区分性特征。这种研究对掌握语言

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多义词内部的差异更细微、更隐蔽。当一个词每次重新使用时,都有语义变化,但这些变化却是在同一语音外壳下发生的,不涉及更换能指问题。交际者对某些似有若无的语义变迁或视而不见,或觉而不察,因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当语义差异明显,不得不在词典中作为独立义项标出时,辞书编纂者往往把它们看成同一语义常体的变体,即各种转喻用法(换喻、隐喻、提喻以及夸大、缩小、逆喻等)导致一个常体语义演化形成的结果。但实践中很难把所有的语义变迁归结为一个常体的衍生物。严格讲,在没有穷尽所有用法(找出全部可能变异形式)之前,常体-变体理论是无法验证的。有的学者则持另一种极端意见,认为一义一词,没有多义词。波切布尼亚(А. А. Потембня)就说过,“词义中最细微的变化都使它变成另一个词”(Ярцева 1990: 386)。而对说话人而言,一词多义现象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近代对多义词有影响的学说还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观”。但各种用法在哪些方面以及因何相似,均语焉不详,失之空泛。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其“认知框架”概念并不能切实维护词义的内在统一,只是对现成词义的解释说明。对此,帕杜切娃的评论是“在Langacker 1987年的书及其后一系列认知语言学的著作中建议把各种意义联结在一起的办法是赋予整个词一个认知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下就规定了所有意义,但却不描写任何一个实际意义”(Падучева 2004: 16)。此后,上述学说的大多数信奉者凭借精心编造或信手拈来的例子宣扬家族相似论或认知结构说,却很少有人按照这些观点系统地、切实地描述具体的多义词。(华劭 2014: 88)

因此,对于多义词的研究,一方面涉及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另一方面也亟需研究范式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学者以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研究方法,在多义词研究领域提出了词义的动态模式,它吸取并发扬了认知语言学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前景-背景观、关注焦点、范畴等思想),使“家族相似”的构想化为现实。(蔡晖 2010 2011) 斯拉夫认知语言学学会副会长 Tore Nessel 称为“令人激动”而“震撼的”发现(Падучева 2009: 646-649)。

至上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研究进入多义词时代,难怪安娜·扎丽兹尼亚克(Анна Зализняк)敏锐地指出,阿普列相的经典著作《词汇语义学》(1974)如今被奉为多义词研

究的圭臬,而非上世纪70年代起被尊崇的同义词研究典范,其副标题“语言的同义手段”几乎被人遗忘了(Падучева 2009: 640)。

由此形成的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是:词语的语言运作(搭配性能、语法聚合体的不完整性等)根本上取决于其意义。词语一般有若干个意义,每个意义都预先规定自己的语言运作性能。由词语的语言运作特征反观其意义特征的阐释性词义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和完善。

4 多义词研究由对语言外因素的认定转向语言本体

随着对语言意义描写方法的不断完善,多义词的研究让人越发觉得问题的艰深: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几乎任何一个词语的意义都不是单一的,某些词语的意义甚至可以多达几十个。因此维护词义的内在统一自然成为多义词研究的终极诉求之一,并逐渐成为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语言语义学研究的共识(Janda 1985, Падучева 2009: 644)。

上节提到过的多义词研究遇到的难题,一度使多义词研究徘徊不前,无论是传统的词义关系联想学说还是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框架思想,都只能算是对语言外因素的认定。词汇语义的发展变化,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这些超语言因素所起的作用,词汇-语义体系本身特有的规律对词义的演变和新义的产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语义发展的外部原因终究需要通过语言内部机制起作用。如何将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内化并体现在词义内部要素的变动上,成为俄罗斯语言学家率先反思词义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研究再次站在世界的前沿。

当代语言学研究的“词典化”倾向、多义词研究地位的确定、对观念化现实的关注、认知语言学对隐喻-转喻概念的更新,无不旨在从语言本身出发研究词义变化的动态模式应运而生。

俄罗斯学者(主要指帕杜切娃带领的“俄罗斯词义信息库”项目研究课题组)采用的动态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时研究。后者是通过历史比较方法,探索、描写语言要素在系统内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其目的在于发现这些要素的发展规律,恢复建构语言的历史。它面向过去,与共时描写对立:同一语素变化前后的形式和意义是不能同时共存的。而词义的动态描写涉及的是一种衍生关系的研究。如果说构词法描写的是词汇衍生,生成语法探讨的是句法形式的衍生,那么这里研究的是一词之内的语义衍生,致力于探讨如何

从初始单位派生出新生的单位,通过规则、模式、形式化、程序化等方法把衍生的理据、条件、环节、派生手段加以概括,形成动态发展模型。塞尔维亚学者库里罗维奇(Е. Р. Курирович)称为衍生活动的共时重建。当然,这里的共时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点,而是索绪尔所说的“稍稍长的特异共时”。可以说,衍生现象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变化,重建的目的就初始单位而言,在于分析其意义、结构、功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性质的变化,从而预见其衍生的方向甚至后果;就衍生单位而言,当人们初次遇到它,特别当它是新的句子形式、新词、新义时,可以重建衍生过程,联想初始单位,在由旧到新的先后顺序中,蕴含着因果关系,可从中得出有理据的解释。由于衍生关系是在广义的共时内发生的,因此不难找到初始单位,从而容易验证解释的正确性。这样,词汇动态研究,重建语义衍生历史,面对的是共时现状,甚至涉及可预见的未来。可见,它在研究的方法、目的及与共时的关系方面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历时研究。(华劭 2014: 88)

词义的动力研究将描写普遍(语义衍生)模式视为恢复词语内在统一的途径,有规律的多义性被模式化为词义衍生(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деривация/semantic derivation),该模式能够通过一个意义获得另一个意义,意义间是互有联系的。多义词所有意义就如同层级系统,而且该层级系统还能够构成一个衍生关系树形图:从一个意义得到另一个意义,最终回归到共同的根系或若干根系——词语的初始意义,多义词词义聚合体^①就呈现为语义衍生模式作用下形成的有序系列。研究表明,这样的衍生模式数量很多,但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此并非不能穷尽,它们可以复现并适用于很多不同的词,有时可达成百上千个词语。

应当指出,从本质上讲,语义衍生是多义性描写的一种手段。这里并不保证所有的语义衍生都曾经真实地发生在俄语语言历史中,更多指的是一种相互关系,也就是一个意义相对于另一个意义的理据性,理据性更适用于一般的词汇衍生或构词活动,在这里富有创见性地把它运用于词义衍生活动中了。

除了恢复词义的内在统一,词义研究的系统是词义动态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每个词的微型系统被当成词内的语义聚合体,从一个意义可衍生出另一个意义,就像词形变化聚合体那样,能从一个语法形式引申出另一个形式。有人提出,所

有意义演变的总和可构成“词汇语法”,“词汇语法”这一富有创意的想法就是建立在词汇系统性基础之上的。

显然,词汇系统性不仅仅体现于单个、分散、孤立的多义词的结构中。为此,研究者确立了一些词义参数,它们是动词的分类范畴、主题类别、参项的角色配位、参项的分类类别。这些参数既是词义的基本要素,同时它们的变化会带来词义有规律地发生变化,词义因此而得以区分。(蔡晖 2009)帕杜切娃解释说,所谓“词义参数是一组特征,根据它把词集合为大的类别,每个类别中的诸词在语言运作上有着不寻常的相似性。一个词烛照另一个词,从而使人觉察其前未被注意的性能”(Падучева 2004: 523)。

以参数化的方法进行词义研究,不仅能够检验和解释现有的词义,而且能够预测和推导出词义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与传统词义研究相比,在该框架中建立的词义动态研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 结束语

语言语义学的研究,特别是对词汇语义的研究,堪称整个语言学发展的晴雨表,反映语言学研究的节奏和律动。在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五个年头,有必要对俄罗斯语义学的发展过程和基本走向进行总结和展望,从语言的生成观到解释视角的转换,从形式—意义研究转向观念—现实研究,从同义关系转向多义关系,从对词义的清点到以语义衍生模式为依据的层级分布。这些变化和转换虽不及“乔姆斯基革命”那么具有轰动效应,但它却刷新和颠覆了一系列传统思想和观点,关注以往忽视或无力探究到的领域,为语言语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继续彰显俄罗斯语言学独树一帜的魅力,也是俄罗斯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做出的又一贡献。

注释

①聚合体是帕杜切娃从语法学中借过来的一个概念,用于对多义词语义结构的研究。词义研究的动态视角把多义词意义的总和看成由语义衍生相互联系的词位聚合体,可称为有规律的多义现象中的聚合体(парадигма регулярной многозначности)。聚合体的概念为恢复词义的内在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参考文献

蔡 晖. 词义研究的参数化[J]. 外语学刊, 2009(1).
蔡 晖. Е. В. Падучева 词义动态模式研究特色与创新

- 价值系列研究[J]. 外语学刊, 2010(5).
- 蔡 晖. 多义词研究的崭新视角——E. B. Падучева 词义动态模式系列研究之二[J]. 外语学刊, 2011(4).
- 华 劭. 词汇语义的动态研究补遗[J]. 中国俄语教学, 2014(1).
- Chomsky, N. *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M]. N. Y.: North-Holland, 1977.
- Janda, L. *The Meaning of Russian Verbal Prefixes: Semantics and Grammar* [A]. M. Flier, A. Timberlake. *The Scope of Slavic Aspect* [C]. Columbus,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85.
- Langacker, R. A.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ierzbicka, A. *Semantics: Primes and Universals* [M]. Oxford, N. Y.: Oxford UP, 1996.
- Апресян Ю. 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M]. М.: Наука, 1974.
- Апресян Ю. Д. Интегра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языка и системная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M].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5.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И. М. Сфера действия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M]. М.: Языки рус. культуры, 1996.
- Булыгина Т. В.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ипологии предикатов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A]. О. Н. Селиверстов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ипы предикатов [C]. М.: Наука, 1982.
- Булыгина Т. В., Шмелев А. Д. Языков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изация ми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M]. М.: Языки рус. культуры, 1997.
- Зализняк Анна А., Левонтина И. Б., Шмелев А. Д. Ключевые идеи русской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M]. М.: Языки рус. культуры, 2005.
- Мельчук И. А. Опыт теор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моделей “Смысл \Leftrightarrow Текст”. Ч. 1. Семантика, синтаксис [M]. М., Наука, 1974.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M]. М.: Наука, 1985.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Нужен ли семантике эпитет «когнитивная»? [A]. Падучева Е. В. Статьи разных лет: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C].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9.
- Рахилина Е. В. Основные идеи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семантики [A]. А. А. Кибрик, И. М. Кобозева и И. А. Секир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C]. М.: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2.
- Чернышева 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лексикона сегодня и учебны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9(4).
- Урысон Е. В. 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Аналогия в семантике [M].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3.
- Ярцева В. 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Z]. М.: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收稿日期: 2014 - 08 - 03

【责任编辑 李洪儒】

第三届中国外语界面研究高层论坛即将召开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界面研究已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学术界对界面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也已形成共识。为交流我国外语界面研究的方法, 检验近年来界面研究的成效与成果, 进一步加强我国外语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2015 年 5 月 7 - 9 日在湖南张家界召开第三届中国外语界面研究高层论坛。论坛由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

主 题: 外语界面研究: 方法与效应。

主要议题: (1) 外语界面理论研究的涵义与方法; (2) 认知与文化“转向”对外语研究的界面影响; (3) 语言学、文学、翻译、语言教学研究中的界面问题; (4) 英美界面研究前沿问题; (5) 与会者感兴趣的其它界面研究问题。

会议时间: 2015 年 5 月 7 - 9 日。

报到时间、地点: 5 月 7 日全天报到; 闽南国际酒店(湖南省张家界市子午路 18 号); 会务费: 800 元(研究生减半)。

联系人: 丁健琼(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 手机: 13648312192 邮箱: 853719379@qq.com)

修伟(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手机: 13974471187 邮箱: xiuweimail@163.com)。

有关会议详情请关注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处网站(页): <http://kyc.sisu.edu.cn/>